

# 数字化驱动下乡村空间变迁与治理转型研究

罗萍嘉,张雅芸

(中国矿业大学大学 建筑与设计学院,安徽 徐州 221116)

**摘要:**“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伴随网络化、信息化的到来,我国乡村空间向多元方向变迁,其社会关系也存在重构趋势。数字乡村治理刻不容缓,论文针对“乡村空间变迁与治理转型”,着重研究数字化驱动下乡村的“空间互构”和“关系互嵌”,从“空间变迁-关系重构-治理手段”三个维度出发,构建关系取向理论视角下的多元网络数字化治理模型,创新“多元互动”数字乡村治理体系的实现路径,以此来推动数字社会治理结构的变革,最终达到治理转型的现实需要,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数字化;空间变迁;乡村治理;治理转型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3)06-0093-08

## 一、引言

乡村振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仅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战略目标。在“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战略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以乡村空间为载体的“数字乡村”建设正在不断深入。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乡村,为乡村社会转型注入不竭动力的同时不断加强乡村空间数字化治理趋势。2019 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数字乡村”是新时代“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推进农村信息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加快建设数字乡村,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推进数字乡村治理体系的变革。由此可见,数字化乡村治理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数字化嵌入乡村社会并重构乡村空间治理的创新路径日益清晰。

数字化不仅仅改变着治理手段,更带来了乡村

空间的变化,其隐含着治理结构的深刻变化,同时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问题与新要求。从数字技术应用来看,目前研究数字化乡村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字化变革乡村治理模式。在资本与精英下乡助力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下,需要全方位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水平<sup>[1]</sup>、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策略体系<sup>[2]</sup>,构建多元共治的大数据系统和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的保障体系<sup>[3]</sup>。二是治理工具数字化。即通过数字化手段,把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都进行数字化管理,以大数据驱动新时代乡村治理的路径建构<sup>[4]</sup>和“治理体系”的数字化,以机制与逻辑引导多元共治<sup>[5]</sup>,让治理工具更加便捷、高效,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效率。三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学者们提出数字技术赋能下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形成空间规划、制度改革、管理创新、多元参与的治理策略<sup>[6]</sup>。并且实行“脱域性治理”模式可以达到治理主体的多元、治理客体流动和治理手段多样<sup>[7]</sup>。由此可以看出,数字化技术逐渐应用于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乡村空间被视为数字乡村建设进程的主要载体。但是,乡村空间数字化治理不是技术应用与空间治理的简单叠加,而是需要明确以下议题:数字化如何让乡村空间变迁

收稿日期:2022-09-17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化驱动下乡村空间变迁与治理转型研究”(23SHB01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基于 GIS/BIM 的乡村统建住宅协同设计模式”(2018YFD110090503);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2022WLJCRCZL324)

**作者简介:**罗萍嘉(1977-),女,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数字乡村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张雅芸(1999-),女,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数字乡村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E-mail:13278883019@163.com

与治理转型产生关联?数字化下乡村空间演变与重塑面临哪些困境?数字化驱动下的乡村空间治理路径何以实现?

从社会空间理论视角来看,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数字乡村”不能仅理解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的乡村治理,而应该被看作是“乡村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与“社会治理结构”的重塑。1974年,列斐伏尔提出“空间关系也是社会关系”。快速城镇化导致乡村空间不断被解构、异化,由此带来乡村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在此认识基础上,部分学者从空间理论入手,探寻乡村治理的空间逻辑。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乡村社会是由血缘和地缘决定的“差序格局”式的次序关系,新时期的乡村社会也由伦理性、政治性转向市场性的差序格局<sup>[8]</sup>。其次,“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使社会关系的研究突破物理空间局限:世界著名的信息社会研究专家,曼纽尔·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认为信息技术扩展了现实空间,使社会原有空间与新的流动空间断裂,导致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现阶段,部分学者逐步发展出基于“空间关系”的治理体系研究:学者吴越菲基于“关系转向”重构一种不同空间尺度关系型的乡村治理体系<sup>[9]</sup>;学者丁波建构了“空间形态—权力结构—联结关系”治理主体权威重塑的重组框架<sup>[10]</sup>。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立足于治理转型语境,对乡村“空间变迁”导致“治理转型”形成了共识,认同数字化技术对乡村治理手段的影响,并且意识到乡村空间变迁中“关系重构”是“乡村治理”的关键。但是,已有研究对“数字化”带来的空间变迁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认识不足,尚未形成按照社会发展规划进行乡村空间内涵的多维认知与分析,同时缺乏在空间变迁中对“关系重构”这一核心变量的分析。并且从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多元互动”与“关系重构”治理机制多停留在理论阶段,尚未形成数字化的“治理有效”路径。事实上,伴随着数字乡村战略的不断深化,数字技术催化下的“空间变迁与延伸”解构了乡村的公共交往空间、产业空间和治理空间,造成了乡村社会关系形态的变化,直接造成治理结构松散断链、治理路径对接不畅等问题,影响乡村治理的有效性。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和回顾

相关研究,结合空间社会学理论,通过深度剖析“空间变迁—关系重构—治理转型”之间的相互型构关系,识别数字社会的治理需求和有利机遇,探索数字化时期的多元互动治理路径,以此来推动乡村社会治理转型,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 二、数字化时代的乡村空间演变与重塑

随着全球信息化浪潮的袭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发展带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空间的结构与形态,进而重塑了乡村空间的治理体系。数字化转型下的空间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1. 空间形态与内涵的变革

乡村空间形式与内容的变革,即由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数字化社会的转变。农耕社会即传统乡村社会,传统乡村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大多农民聚村而居,以血缘与地缘捆绑在一起。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使得乡村里的人口是附着在土地上的,因此以农业谋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乡村空间结构是以乡村聚落为基本单元的小尺度封闭结构,居住在村落中的农民与自然、环境、邻里关系相互依存,形成一种基于熟人关系的社会生活秩序。但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打破了原有的封闭空间结构,乡村聚落成为了工业文明生产和消费空间,乡村空间逐渐由封闭向开放转变。在我们社会的极速变迁中,部分传统乡村的平面式、散点式布局在政府规划的强制外力下呈垂直向上、单元化、社区化新空间格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村改居”社区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举措被广泛开展。“村改居”社区作为农村就地城镇化的产物<sup>[11]</sup>,是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发展运动,主要表现为“撤村并居”“农民上楼”等一系列物理空间布局的变革。其次,乡村物理空间的变革导致乡村社会的结构和形态发生变化。居住空间布局的巨大变动带来的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变革,农

民的社会空间也发生了改变。伴随着城市化的扩张,乡村物理空间的变迁带来了社会空间的表征性变化,传统乡村社会状态被打破,政府对乡村地区的规划带来了传统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变革。作为传统乡村社会交往与沟通的场所——宗族、集市、晒场、田间地头等空间的重构或消失,打破了乡村的稳定社会秩序,取而代之的是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等。与此同时,市场化和资本下乡引入了外来工厂、旅游业等新兴产业,带动了乡村消费空间的变革。交通技术的快速发展连通了城市和乡村,城乡之间的连接逐渐增强,乡村不再是封闭的状态,实现了人的空间自由。迈入数字化时代,我国乡村空间呈现多元空间共同支配着村民生活的特征,即传统乡村空间的延续和新型网络空间的兴起<sup>[12]</sup>。随着数字化战略的深入,新型网络空间出现又将重塑乡村空间。

## 2. 乡村社会关系更迭

乡村社会关系更迭即由传统乡土社会中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形成的熟人关系网络,转向新型日常生活范式下互动减少的“半熟人社会”关系、新兴数字条件下开放性的“数字社会”关系。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熟人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由于地方性的限制、世代人口的积累、农民生活依附于土地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还在熟悉的地方长大。正如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中所言:“乡村社会,就是人们通过密切的、长久的共同生活而形成的一种相互的行动,这种社会关系,是一种慢慢长成的、熟习的、甚至到了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sup>[13]</sup><sup>10</sup>在那个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下,农民的生产活动与日常活动合并在一起,他们的生活属于承认他们社会联系发展的一群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传统村落被大量拆除、城市边缘地区或小城镇被规划进城市建设中,农村户籍被转为城镇户籍,迫使乡村人口快速向城市流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资本下乡带动下,大量村民选择外出打工、经商和创业,外来人口流入与村籍人口流出频繁。同时,家庭生活和生产活动也分开了,越来越多的在籍村民被卷入市场经济复杂关系中,开始出现“个人原子

化”趋势。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关系逐渐开始瓦解,传统生产模式范式下相对稳定的“熟人社会”关系逐渐转向新型日常生活范式下互动减少的“半熟人社会”关系。进入网络化时代,通过“宽带中国”“普遍服务”等政策的推行,大大促进了乡村数字化建设。截至2022年12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75.6%,乡村地区网民的数量约为3.08亿<sup>[14]</sup>。数字化技术嵌入到乡村社会,由数字技术形成的虚拟网络空间拓展了乡村空间,延伸出新型数字社会关系网络。数字社会的乡村交往形式更加灵活化、多元化、开放化。在数字化营造的网络空间中,外出务工、求学村民可以打破地理上的局限,随时随地与自己的亲人进行沟通。乡村的发展情况以及政务服务信息,也能有效同步给在外的本地村民。

## 3. 乡村治理手段的变化与困境

数字化转型中的乡村空间是一个由多元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其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形成了乡村空间中一系列独特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在数字时代,乡村社会空间将向更加开放、多元、共享、包容的方向发展。并且熟人关系网络与半熟人社会、数字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迫使乡村治理结构与方式等方面进行变革。传统治理手段与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乡村物理空间的变迁使得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发生改变。传统的乡村治理结构在高密度、立体化、单元化的“村改居”社区中受到冲击。乡村空间形态产生了新的变化,打破了原有的乡村管理机制,面临新的治理难题。原来治理主体的权力结构,随着乡村空间变迁而被稀释甚至消除,社区居民对新的治理主体的权威短期内无法认同<sup>[15]</sup>,无法参与到乡村治理中。乡村内生秩序在乡村空间变迁的过程中遭到了破坏,空间的再造意味着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之间联结关系的再塑,由此引发了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因此,重建乡村社会秩序需要新的空间形态下,重新塑造治理主体的权威,构建新的治理体系。数字化转型中复杂多元的乡村社会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乡村治理结构和手段,实现数字化治理模式下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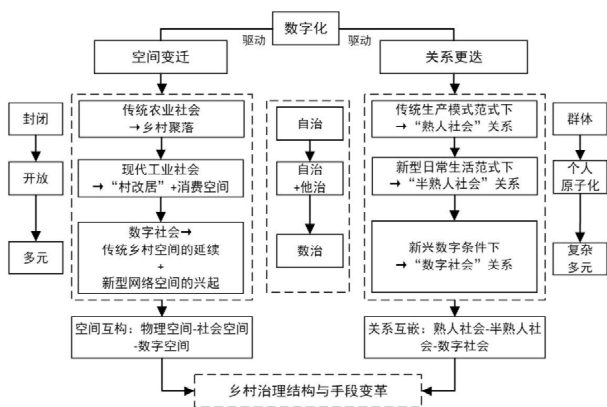


图1 数字化背景下乡村空间变迁与治理转型

乡村熟人社会治理以自治为主,通常依赖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或者大家族的族长来主持公道,协调村民之间的矛盾和利益。改革开放后的乡村治理主要以村民“自治”和基层治理的“他治”相结合。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而且使得治理客体在空间、时间和内容上实现了流动,进而影响到乡村治理结构。数字空间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传统乡村治理结构,乡村治理主体逐渐转向多元化、乡村管理方式向现代“数治”转变。数字化技术不仅提高了社会治理效率,还能为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手段。在传统乡村治理中,治理结构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科层制而形成的,乡村治理主体单一,传统管理运行成本高且效率低下。主要依靠村民自治、传统媒体宣传等手段进行管理,而数字化技术可以更好地通过整合资源、汇集信息、组织协调等方式开展基层治理工作。数字化技术能够对基层治理信息进行及时采集和分析处理,从而为基层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数字化为乡村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困境。一方面,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嵌入,以数据资源为核心要素的数字治理成为乡村社会治理转型的新形式,且应用数字技术而产生的数字空间延伸出了新的数字关系网络以及新的治理手段。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介入乡村社会时会产生新的困境,数字技术的拓展和广泛应用与使用群体之间存在差异性,造成数字不平等、数字鸿沟及其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隔离等问题。因此,乡村治理在数字化的双重影响下,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从“空间变迁-关系重构-治理手段”三者入手,建立健全数字乡村治理体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 三、构建关系取向理论视角下多元网络数字化治理模型

#### 1. 模型建构的理论基础

在社会理论转向“空间”研究背景下,空间作为研究乡村社会的新视角,为乡村治理提供了一条全新的研究之路<sup>[16]</sup>。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提出了“空间的生产是由空间关系所产生的”。福柯认为社会是同时性的、空间并置的网络状结构,空间的建构嵌入关系之中<sup>[17]</sup>。新的社会关系要求一种新的空间,反之亦然。从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向现代乡村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乡村治理结构变革与空间变迁可以看到这一变化过程。乡村空间变迁的推动机制来自于政府权力、信息技术、市场化、城镇化等多重机制的相互作用,“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数字空间”彼此相互影响与相互建构。空间变迁不仅会改变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与行为方式,也会催生出新的社会关系与治理秩序<sup>[18]</sup>。关系取向理论的缘起是对乡村发展中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强调,并将其置于乡村发展过程中来加以理解。其认为,在乡村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且这种变化是动态的、持续的。在城镇化、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村改居”带来的居住空间变革打破了传统生产模式范式下相对稳定的“熟人社会”关系、“政府规划”带来的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变革逐渐呈现新型日常生活范式下互动减少的“半熟人社会”关系、“数字经济”带来的产业空间变革带来了新兴数字条件下开放性的“数字社会”关系。互联网时代下,社会治理模式要体现出理论融合与创新发展的新特征<sup>[19]</sup>。“社会关系”缘起于以物理空间为载体的社会结构研究,乡村空间变迁使得原有的空间秩序不再适用,因此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应再造新型空间治理共同体,重建新的社会关系纽带。

#### 2. 建构多元网络数字化治理模型

以空间社会学理论作为模型的基础,从“空间变迁-关系重构-治理手段”三个维度出发,将“多元交互”作为乡村治理转型的现实目标,构建一个“多域性治理结构”“多尺度治理路径”“多维度治理

手段”的乡村多元网络数字化治理理想模型(图2)。创新“多元互动”数字乡村治理体系的实现路径研究。即X轴——空间变迁,Y轴——关系重构,Z轴——治理手段。该模型中的“X”轴为空间轴——乡村空间变迁的阶段轴,分别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数字空间3个阶段;“Y”轴为关系轴——乡村社会变化的关系轴,该变化为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数字社会;“Z”轴为手段轴——乡村治理转变的手段轴,包括一元主管即熟人社会的家族以及长老统治、双轨治理即地方自治形式化和基层组织行政化<sup>[20]</sup>、多元共治即要把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纳入到乡村治理的体系中来,充分发挥各个部门的作用,建立起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图1中的三轴立体坐标反映了乡村空间变迁与关系重构、治理手段之间的对应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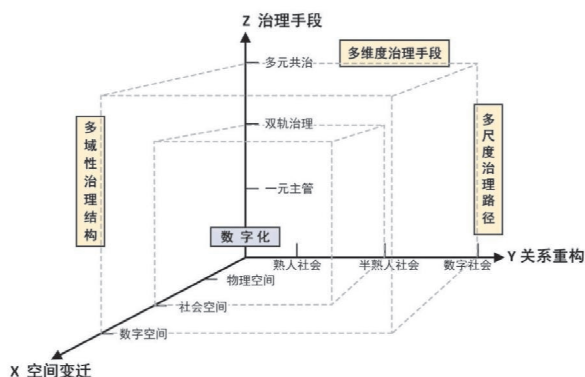


图2 多元网络数字化治理模型

以数字化为驱动核心,“X-Y-Z三轴”(阶段轴、关系轴、手段轴)中每个轴要素分别以点连线,在数字化技术的嵌入下,形成在不同阶段,多关系和多手段相互交织的新框架模型,借助数字化技术将各要素信息整合,达到无障碍的数据共享与信息共享。最终实现治理模式从单一线性思维到多维网络化思维,治理范式从地域性治理到脱域性治理的转变。

#### 四、创新“多元互动”数字乡村治理体系的实现路径研究

乡村数字治理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通过乡村数字治理,能够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的精准化,提高乡村治理的效率,增强乡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在构建“多

域性治理结构”“多尺度治理路径”“多维度治理手段”的乡村多元网络数字化治理理想模型的基础上,推动数字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在乡村振兴的基础上促进城乡空间融合(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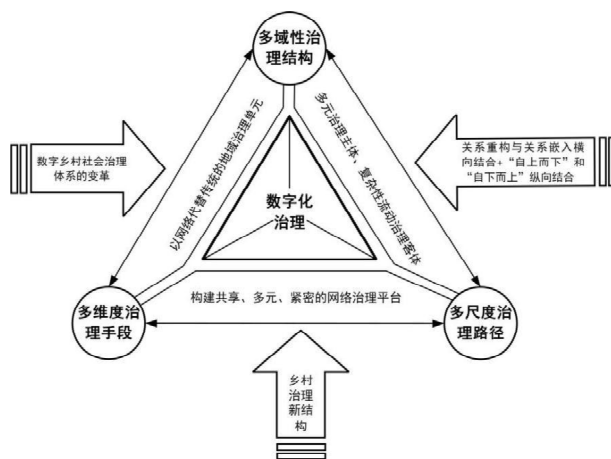


图3 多元互动数字乡村治理体系

##### 1. 搭建“多域性治理结构”

在数字化全面影响乡村发展、建设、治理的时代背景下,数字乡村空间不同于传统封闭的乡村空间,它具有动态性、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乡村向数字化社会演进过程中,治理结构也要随之作出相应变革。作为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新型治理手段,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包括网络、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借助数字空间,利用信息技术,将数据管理、知识要素与乡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相互整合,激发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重构乡村治理体系。

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数字化时代的必然趋势,以网络代替传统的地域治理单元,成为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模式。一方面强调通过技术联通来打破地域性治理范围。将网络技术嵌入进乡村网格化治理,借助网格建立乡村中单元与单元之间的联系,将不同的信息进行资源整合,打破空间分割、碎片化、管理僵局,增强乡村空间内部以及不同规模空间之间的联系,促进治理范围从部分走向整体化;另一方面强调多类型空间之间的融合。当代乡村以社会媒体为媒介成为乡村数字化的表征,社会媒体包括微信、QQ、微博、抖音等。社会媒体突破乡村固定的实体空间限制,超越时空的阻隔,村民作为日常生活的参与者进行信息间关注与交换。因而乡村中的社会关系得以在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数字空间中相互交织。例如上海崇明区向化镇,建

立信息化民生服务平台。借助“人文向化”的小程序,村民们能够随时向乡镇提意见、找帮助,乡村工作的受理与处置更加流畅更规范、核实与分析更智能<sup>[21]</sup>。由此可见数字平台的搭建真正做到了服务人民,群众反映问题、咨询建议更加便捷高效了。数字化平台一方面通过信息化的方式,把分散在各个部门、各个村居的调解站点集中在一起,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另一方面,将民生响应方式提升到“防范在前”的积极主动沟通,使社会治理的触角真正触及到千家万户。数字化技术将乡村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数字空间”不断联结和融合,做到在场与在线结合、网络与网格结合,形成乡村治理的新结构。

## 2. 拓宽“多尺度治理路径”

在迈向数字时代的进程中,乡村“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数字社会”的空间结构,使乡村社会中的主体关系呈现出了复杂性和多元化。治理信息化和交通的发展,促使乡村呈现开放状态,村民作为治理客体具有流动性,外出求学、务工或经商的人如何实时参与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到来解决了这一困境,利用信息平台和技术打破空间的距离限制,既有利于政府发挥主导性作用,也激发了其他主体和客体的积极参与,进行多元治理主体和复杂性流动治理客体的关系重构与关系嵌入。多种社会关系交织,乡村治理不仅需要熟人社会的人文环境支持,更加需要数字化的理性思维和技术建设。

目前乡村最缺乏的并不是治理力量,而是一个能够将各主体的治理潜力有效地聚集起来,并将其转化为治理力量的平台<sup>[22]</sup>。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乡村治理注入新动能。首先是治理手段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着传统的治理手段。数字化技术能够实时感知、准确判断,并根据需要进行智能化处理,从而使得治理更加智能化和高效化。数字技术不仅有助于解决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有助于乡村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促进乡村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效率。基于网络、大数据、通信技术的数字化平台的搭建,将分散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共享,打通政府信息孤岛,打破部门间的壁垒,厘清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责界限,做好精准的公共服务,提供公共

产品,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政府的治理效率,实现“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思维。其次是治理手段综合化。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泛。比如,“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监管”等数字技术正在推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互动和公众之间的互动。村两委、农村企业和事业单位以及民营经营者,通过数字化治理平台监督与建言献策,掌握各组织之间的不同类型的信息,进行资源交换,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实现“自下而上”的社会治理需求有效对接。

## 3. 丰富“多维度治理手段”

数字化浪潮席卷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现代化步伐的迈进不得不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未来的乡村数字化发展必将是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走进现实生活,现实社会空间与数字社会空间时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围绕共商、共建、共治机制,打造更加智慧化、集约化的新型乡村社会空间形态。以往乡村的上传下达治理方式是以村喇叭为媒介通知到家家户户,或者是村干部各家各户的通知。在数字化乡村治理中,政府部门习惯于依赖以往的经验作出决策,喜欢“亲力亲为”或拍胸脯式的地方领导而漠视数字化智能决策。决策者既对流量巨大的数据信息缺乏足够耐心,也对数据信息的深刻内涵与现时价值缺少应有敬畏和充分认识<sup>[23]</sup>,社会治理缺乏数字思维使用“人工智能”参与决策。乡村各类主体治理诉求数据庞大且兼容性很低,加大了数字化平台的整合难度,且这类平台数据信息的流动与传递通常是单向的,达不到数字化治理平台的数据信息整合想要的效果。由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大部分村民数字素养不高,对数字技术的理解与应用也存在局限性。

针对这些困境,对多元主体和流动客体进行“数字赋权与增能”。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构建共享、多元、紧密的网络治理平台,乡村治理的各主体与参与者依托数字技术形成新的社会关系格局,有效发挥多元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优势,实现多元主体有效协作,提升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形成数据共享、多层次、跨部门、开放互动的乡村数字化服务管理体系。一是加强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实现“一张网”联通。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在全国乡村全面普及“互联网+政务”服务,建立健全信息发布、政策咨询、便民服务等功能,提升乡村政务运行效率;二是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制度法规、政策体系和产业支撑体系,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建立乡村旅游发展监测平台,开展大数据统计分析,精准指导资源开发、特色品牌打造和服务提升。推进数字乡村试点建设,探索一种可供多数乡村借鉴、复制的经验范式。三是加强智慧医疗、智慧养老等数字健康服务能力建设;实现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升级。打造乡村多元复合空间形态,将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数字空间的联通成一体,增强多域空间和多元主体的协同和交互能力。推动数字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在乡村振兴的基础上促进城乡空间融合。

## 五、结 语

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是我国乡村振兴的重大举措。乡村化数字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其中一环,通过数字技术助力乡村治理,对促进乡村振兴、促进乡村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数字化视角看待乡村治理,一方面,“数字社会”建构了虚拟的数字空间,突破了传统乡村空间变迁的内涵,解构了传统乡村的社会关系,是乡村治理转型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体系,是推动乡村治理转型的重要途径。通过梳理与总结数字化转型中乡村治理面临的复杂问题,将其归类为乡村空间变迁打破了原有的乡村管理机制、乡村社会关系更迭稀释了治理主体权力结构、数字化治理手段的理解和应用存在局限性。因此,在数字化的多重影响下,提出以空间社会学理论作为模型的基础,构建三维立体的乡村多元网络数字化治理理想模型,厘清“空间变迁”“关系重构”“治理手段”三者之间的影响机制,从而创新数字乡村治理体系转型的实现路径。总体而言,数字化背景下的乡村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动态演变的过程。从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再到城乡空间,数字化的嵌入,让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在物理层面、社会层面以及网络层面都产生了变动,空间变迁与关系重构互相嵌入又互相影响,二者共同推动着乡村空间变迁。因此,在当前治理转

型语境下及探寻数字化空间变迁演变逻辑条件下,如何激活乡村空间内生动力打造数字共同体?进而探寻如何制定适宜的乡村空间重塑政策,促进城乡融合共治?这些问题是未来乡村振兴研究中值得探索的议题,对乡村振兴意义重大。

## 参 考 文 献

- [1] 赵秀玲. 乡村互联网治理的兴起与制度变迁[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59(2): 33-40.
- [2] 苏岚岚, 彭艳玲. 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J]. 农业技术经济, 2022(1): 34-50.
- [3] 谭九生, 任蓉. 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创新[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8(6): 30-37.
- [4] 王欣亮, 魏露静, 刘飞. 大数据驱动新时代乡村治理的路径建构[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11): 50-55.
- [5] 林磊. 近年来乡村空间研究回顾[J]. 北京社会科学, 2021(8): 109-118.
- [6] 顾茉莉, 李鑫. 乡村转型背景下的空间变化、问题及治理策略[C]//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6 乡村规划). 2021.
- [7] 谢小芹. “脱域性治理”: 迈向经验解释的乡村治理新范式[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3): 63-73, 157.
- [8] 刘小峰. “差序格局”的变与不变——乌庄的历史表达(1949-2016)[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 [9] 吴越菲. 重建关系性的“乡村”: 实体主义乡村发展观的关系转向及其实践脉络[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9(4): 28-36, 157.
- [10] 丁波.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间变迁及乡村治理变革[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6(6): 48-55.
- [11] 陈鹏. “村改居”社区研究述评[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1, 32(5): 283-286.
- [12] 董运生. 演变与重塑: 中国农民生活空间的变迁[J]. 江苏社会科学, 2018(6): 43-49.
- [13]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9.
- [14]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J].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23, 32(2): 39.
- [15] 顾永红, 向德平, 胡振光. “村改居”社区: 治理困境、目标取向与对策[J]. 社会主义研究, 2014(3): 107-112.
- [16] 陆益龙, 韩梦娟. 村落空间的解构与重构——基于华北T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考察[J]. 社会建设, 2020, 7(1): 44-57.

- [17] 何雪松.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J]. 社会, 2006, 26(2): 34-48, 206.
- [18] 丁波. 空间治理: 空间变迁视角下乡村治理重构[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39(5): 102-107.
- [19] 林聚任, 申丛丛. 后现代理论与社会空间理论的耦合和创新[J]. 社会学评论, 2019, 7(5): 15-24.
- [20] 王向阳. 新双轨治理: 中国乡村治理的旧制度与新常态——基于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7(2): 67-79, 125-126.
- [21] 盛赛丹. “数智大脑”守护乡村[N]. 崇明报, 2022-12-12(03).
- [22] 江维国, 胡敏, 李立清. 数字化技术促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研究[J]. 电子政务, 2021(7): 72-79.
- [23] 王胜, 余娜, 付锐. 数字乡村建设: 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施策略[J]. 改革, 2021(4): 45-59.

## Study on the Rural Spatial Change and the Governance Transition Driven by Digitization

LUO Ping-jia, ZHANG Ya-yu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is a basic requiremen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advent of networking and informatization, the rural space in China is undergoing diversified changes, so the social relations tend to be reshaped and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admits of no delay. As far as “the rural spatial change and the governance transition” is concerned, this paper focuses on rural situation of “mutual construction of space” and “mutual embedding of relation” driven by dig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dimensions like “spatial change, relationship reconstruction and governance measures”, a multi-network digital governance model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relation orientation theor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innovate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multi-interactive”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so a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the digital society and finally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governance transition.

**Key words:** digital; spatial change; rural governance; governance transition

【编辑 高婉炯】